

元末士人拯世情怀与经世意识述论

展龙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在元末王道失坠、纪纲不振、教化凌夷、吏治腐败、风俗颓废之际, 广大士人的卫道精神、拯世情怀骤然升腾, 更趋强烈。他们或入仕为宦, 拯时济世; 或评论时宜, 建言献策; 或务求实学, 引领学风。虽然迫于时势, 士人的经世意图屡遭推抑, 极难如愿, 但他们的经世努力, 无疑彰显了其浓郁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针砭时政, 排难解纷, 矫正世风的重要历史作用。

关键词: 元末; 士人; 拯世; 经世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经世观念乃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深刻影响了历代士人的心理趋向和行为方式, 成为其共同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作为士人精神品格的行为体现, 经世不仅表现为直接入仕, 也表现为在宦途之外, 自觉将个人言论、行为与社会联系起来, 以间接实现社会价值这一更为深刻的价值意义。所以说, 士人经世的途径并非入仕一途, 尤其在政治颓败, 纲纪不振, 人心浇薄的衰世时期, 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便会骤然凸显, 其经世的途径亦会趋于多样, 甚至遁入释道之士, 虽身处方外, 其内心深处, 根深蒂固的经世之念亦并未全然泯灭。同样, 在元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 士人的经世观念也通过多种方式表现了出来。在时人的视野之中, 元末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 纪纲不振, 教化凌夷, 吏治腐败, 风俗颓废, 赋税沉重, 僧道泛滥, 土地兼并, 科举不公等。这些社会问题, 让敏感于时势的士人们刻骨铭心, 思绪跌宕,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求治进取, 以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践履了作为士人的卫道精神和拯世情怀, 于是传统的经世观念日渐凸显, 蔚为风潮。

一、入仕为宦, 拯时济世

元末士人所处的世界, 是一个危机丛生的“衰世”。因而, 一大批讲求事功的士人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所亟需解决的问题上, 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实现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参与政治, 跻身为宦。

不言而喻, 入仕无疑是多数士人入世方式的第一选择, 即使身处衰世也毫无例外。元末, 广大士人扶危定倾, 身任天下的意识逐渐升腾, 倡扬: “人才之生于斯世, 必为邦家之用, 以立功立事, 黜黜皇猷”。^[1]为此, 他们企图通过不同路径进入宦途, 以借助国家权力的支持来匡时济世, 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这中间, 科举一途布满荆棘, 但仍是士人孜孜以求的入仕途径。举凡闻名于时的士人大多都有科举经历, 虽然他们绝大多数蹶于科场, 但仍皓首穷经, 以期搏得一第, 其强烈的入仕意识昭然可见。如, 刘基(1311-1375), 自幼受到儒道思想的沐染, 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思想驱使着他沿着科举的道路步步迈进。最终于元统元年(1333年)一举考中进士。王冕(1310?-1359), 字元章, 号煮石山农, 浙江诸暨人。早年以科举为事, 尝以伊尹与吕尚自期, 他在《闰七月二十三夜记梦诗》诗中言: “平生伊吕志, 耕钓岂无为?”^[2]又在《自感》诗中云: “愿秉忠义心, 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 还淳洗器虚。声诗勒金石, 以显父母誉。”^[3]皆明确表达了其经世济民, 向伊尹、吕尚那样佐明主, 成王业, 以实现国治俗美、显亲扬名的理想目标。但王冕蹶于场屋, 屡试不中, 遂绝意科举, 将希望寄于未来, 他仿《周礼》撰成一书, 说: “吾未即死, 持此以

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4]入仕意识仍未泯灭。

除用意科举外，有不少士人或响应朝廷征聘，或毛遂自荐，出仕为官。如：柳贯（1270-1342），字道传，号乌蜀山人，浙江婺州人。至正元年（1341年），朝廷更化，征用老成，年已七十二高龄的柳贯以台阁之荐，起任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对此，柳贯感慨万分：“吾今幸亲禁近，得陈尧舜之道以赞太平之治，死不恨矣！”[5]言语间透露出能够再次佐命朝廷的激动心情。李士瞻（1313-1367），字彦闻，河南南阳人，后徙汉阳。自幼英敏好学。至正初，以布衣游京师，以度支监卿柳嘉之荐，出为知印。至正十一年（1351年）中大都路进士，辟充右司掾，除刑部主事。[6]王祚（1321-1372），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布衣之时曾往大都（今北京）上书中书平章扎拉儿“以自见”，并说：“虽以祚之贱微，其不自揣量，辄欲自附于门下士之列，踰涯犯分之罪，有不复避也。……惟相国重念国家之所以立在人才，而益以天下人才为意，不以祚之卑贱为陋，而养育以奖拔之，则岂为祚之幸，将天下人才皆以为幸矣。”[7]另外，傅若金（1303-1342），字与砺，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元统初荐为参佐，出使安南。吴当（1297-1361），字伯尚，江西崇仁人，至正五年（1345年）荐为国子助教。凡此，通过举荐踏入仕途者在元末不为少数。这既反映了朝廷“急于用人”[8]的真实状况，也折射出有识之士谋求入仕的强烈愿望，所谓：“生平若有文章癖，老大仍悲岁月增。馆阁祇今招隐逸，吾曹何日见飞腾？”[9]

元末士人之所以愿意仕进，其原因与传统士人的经世观念若出一辙，即在于“自致其身”，“有济于时”，而不愿苟且偷生，“与草木俱腐，与时流偕焉”。[10]故在不少士人的心目中，只要能为朝廷官员，获得用世的机会，他们是不大计较出任任何官的，如刘基所言：“士有急于用世者，非苟为利禄计也，少而学，壮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则抱材而无所施。……今之由学校掌出内为儒官，循次待用，至得一教授，亦难矣。”徐舫（1298-1366）也说：“吾非乐为吏，每意有不合，辄欲舍去，适朝论复省台，欲拯禁榷之弊，为庶民请命。”[11]出乎此，部分士人在进身无路的情况下，即使出任卑微的学官之职也心甘情愿。这一点，时人有肺腑之言：“学官位卑禄薄，吾耻与草木同腐，固不敢辞知己之荐，庶几古人为贫而仕也。……遗逸、科目之举，视学官其秩为崇，然君子所以思其职者，则不以崇卑而有间也。”[12]必须承认的是，跻身宦途只是士人践行经世观念的开始，接下来，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如何建功立业，利济苍生，排难解纷，勇于任事显得尤为重要，“君子之用世，得百里之国而治之，使其民出租税，勤役作以供公，上而无愁苦叹息之声，亦可谓贤大夫矣。”[13]然而，在元末王道失坠，士风颓弊的环境中，士人的仕途往往颇为坎壈，所以“士人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14]这是时代对士人济世之志的摧折和贬抑，也是士人自身的悲剧之所在。

二、评论时宜，建言献策

居衰乱之世，士人的拯世情怀不仅表现在入仕等政治行为上，也表现在其言论、话语之中。针对元末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据理剖析，向统治者提出自己的主张，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进而达到拯溺济危、重整秩序的目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士人的言论就成为我们洞察当时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尺。他们自觉通过更为广泛的言论、话语方式充当了社会的良心。一方面，在道德层面上，他们纷纷希冀通过格君心、正人心以振纲纪、定治乱，认为这是治道之本。同时，通过道德修养、纲常礼教的说教来训导百姓服从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层面上，他们坚持以君子的原则，开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治世良方，以期在弥补统治者昏乱造成的政策偏差之时，进而成为统治者创业垂统、治国安邦的策略和途径。应该说，在元末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士人借助言论来表达炽然的用世热情，虽是间接，甚至幻想的，但也是难能可贵的，用时人的话说就是：“士人当废兴存亡之际而能秉节守义，归洁其身，为清议所予。其言论风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宝之”[15]；“士君子以平生之志，发为一时之言，而一时之言或为终身之符”。[16]

概言之，元末士人评论时宜，建言献策的方式大体有二：一是直陈时弊，贡献筹谋，即在言论中明确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式，这一方式的特点是直白而具体；一是托物为喻，揭露时弊，即表面上不谈时政，但言论中间仍蕴涵着丰富的现实因素，这一方式的特点

是含蓄而深刻。而且，为了使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能被统治者接受，真正达到经世的目的，士人评论、建言的方式往往在口气上显得较为务实，平和和理性，而不是单纯、偏激的讽刺，抑或犀利、激烈的批判。

（一）直陈时弊，贡献筹谋。

元末士人在参与政治，体察民情，感悟生活的过程中，对诸多社会问题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如，对于财政问题，提出：“盖治民者为国之大端，理财者经国之要务”[17]；“夫理财之方，一皆见之行事之实，而非空言之无证者”[18]。对于教化问题，提出：“夫庠序之教，世俗以为迂而有识者以为急，若使教之有素，则民有恒心，莫不知尊君亲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于邪僻以犯非义乎，立民防而导其善其于治化，夫岂小补哉”[19]；“夫学校以明伦为本，育才为务，风化之所由出也”[20]；“教化不明，纲常沦废”[21]；“教化实为治之本。”[22]对于吏治问题，提出：“圣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纲，圣人治吏不治民”[23]。基于上述认识，士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针对元末的社会问题，以上书、言事等方式讽谏君臣过失，评论政治得失，并向执政者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如，王祎曾以布衣之士，向中书平章扎拉儿上书，其中对人才的重要性及荐拔人才事宜发表了看法：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为人才，在国家……然则国家人才，岂非相资而成者哉，故尝考近代所以养育奖拔人才之道矣，以为人才难得，而且难知也，非博采广求而多畜之，不足以尽天下之士，故先馆阁以为育才之地，其进之之涂有三，而大臣荐举居其一。……我国家之制，设学校、科举以待天下之士，而士之出于山林岩穴间者，不必由于学校，负瓌奇特杰之器者，不必由于科举，故仍有荐举之法焉。士之以布衣而入馆阁，由馆阁而登台省者，往往而是，可谓盛矣！自顷者荐举之法废不复行，馆阁用人，一切拘于常调，布衣之士始无所于进矣。然犹幸王公大人以人才为意，如相国者为之依归，士之有问学、文章、材行、艺能，凡一长可自见者，皆得以自附于门下，不遂至于弃滞。……惟相国重念国家之所以立在人才，而益以天下人才为意，不以祎之卑贱为陋，而养育以奖拔之，则岂为祎之幸，将天下人才皆以为幸矣。[24]

在此，王氏首先道出了国家兴亡系于人才的重要性；接着反顾祖制，指陈时弊，认为元末虽然重视养育人才，但由于荐举之法“废不复行”，致使许多“布衣之士”难得进用。所以，他建议执政者“以天下人才为意”，不拘一格，加以奖拔。应该说，王氏所言切中了元末在人才政策上的缺失。

王祎所论仅着眼于人才问题上，但更多的时候，士人评论时政、建言献策并不囿于某一社会问题，举凡关乎国运民生之事，皆是其关注、评论和建言的内容。总体上，元末士人的评论和建言往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在其言论中间，传统士人单调、空泛的道德说教和理论诡辩色彩显得甚为淡薄。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元末士人的言论有了更强的经世意味和社会政治价值。如：王结（1275-1366），字仪伯，河北易州人。元统初年，在任中书左丞时，曾向中书省提出八事：一曰立经筵以养君德；二曰行仁政以结民心；三曰育英才以备贡举；四曰择守令以正铨选；五曰敬贤士以厉名节；六曰革冗官以正职制；七曰辨章程以定民志；八曰务农桑以厚民生。[25]王结所论，个个切中时弊。如在评论人才问题时指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今日必当广求俊贤，昭布庶位。”[25]成遵（1308-？），字谊叔，穰县（今河南邓州）人。元统元年（1341年）中进士第，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正二年（1342年），拜监察御史。当年，成遵先后言事并举劾凡七十余事。最早，“言天子宜慎起居，节嗜欲，以保养圣躬，圣躬安则宗社安矣”。言辞甚切，顺帝动容称善。不久，又直言台察四事：“一曰差遣台臣，越职问事；二曰左迁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尽言，循叙求进；四曰体覆廉访声迹不实，贤否混淆。”这些建议顺帝皆喜纳之，并谕台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风纪旧规也。”此后，逢江浙火灾，建言“当赈恤”；又言时务四事：一曰法祖宗，曰节财用，曰抑奔竞，曰明激劝。顺帝皆称善从之。[26]贾鲁（279-1353），字友恒，山西高平人。至正九年（1349年）十二月，任漕运使，鉴于当时漕运之弊，建言二十余事。其中，对于其所提出的“京畿和糴”、“优恤漕户”、“接运委官”、“疏浚运河”、“宜以宣忠船户付本司节制”

等八事，顺帝予以准行。^[27]成遵、贾鲁所论，皆是针对社会痼疾开出的救治良方，顺帝能一一采纳，一定程度上使其言论成为了元廷经邦治国的方略，这也正是士人政治功能之所在。

同时，在元末建言时政的士人群体中，不仅有在任的官员谏臣，也有在野的处士隐者。他们虽遁居民间，不便直接与朝廷对话，但在经世观念的驱动下，仍然积极寻求机会与执政者接近，以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正可谓“君子处畎亩，而不忘天下之忧。”^[28]如，黄许（1282-1362），字与可，浙江处州人。早年与怀玉人郑元善，同里叶峴、林定老交往甚笃。后三人皆中进士，而黄许独不遇。^[29]至正中，元廷遣大臣宣抚各道，黄许以处士身份献“救时十策”：严选举，革贪污，除吏蔽，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核田赋，兴武举，作士气，结人心。磊落数千言，皆关涉世运安危，“可以救乱于未形，兴治于将来”^[29]，充分表现了其拯时救世的济世情怀。但身为处士，位卑言轻，其所献“十策”终未被用。后来，义旗四举，天下大乱，中书省参政普颜帖木尔、内台治书侍御史李国凤奉诏经略江南，获得“十策”，叹曰：“世未尝无经济才，上之人顾弃而弗求耳！”^[30]言语间，透露出对“十策”未被早用的缺憾，同时也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一定程度上，士人的言论具有较强的预见性，正是这种视野宏远的先见之明，才使得士人的经世观念多了几分扶翊兴运的资本，也正是这种先见之明，才往往使国家的发展具备一种相对稳妥的方向感。所以作为统治者，在任何时候，且不可忽视士人的这种预见。

应该说，元末士人的言论是相对自由的，朝廷对士人的直言也一度持鼓励态度。至正九年（1349年）九月，曾下诏：“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诏委官选其可行之事以闻。”^[27]然而，在当时也并非所有士人的直言都会得到元廷的认可；相反，某些士人还会因为直言而遭致厄运。如，陶宗仪（1329-1412?），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赴考进士，因议论政事而落第。^[31]朱公迁，至正七年（1347年），以遗逸授翰林直学士后，曾劝顺帝：“亲贤远佞、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不然，恐忧在旦夕。”因言辞切直，为执政者所恶，出为处州学正。^[32]熊鼎，字伯颖，江西临川人。至正七年（1347年），领江西乡试第九名，上京师就礼部试，以其直言时政，议论奇异，竟弃不取。熊鼎不以为然，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遂束书南归。^[33]再如前述成遵，建言七十余事，但最终为“执政者恶之”，出为为陕西行省员外郎。^[26]方克勤（1326-1377），字去矜，号愚庵，浙江宁海人。至正二十四年（1354年），“尝一践场屋，言国家利害，峭直无所顾忌，有司不敢取。”^[34]可见，在政纲失序，奸佞当道之时，士人的某些建言难免会违背当权者的意愿，所以朝廷倡导直言往往流于形式，士人的直言也难以取得预料的效果。

（二）托物为喻，揭露时弊。

这一评论方式往往以诗歌、乐府、杂文等文体形式表现出来，措辞含蓄，然意味深刻，从中仍可体会到士人心系天下之兴旺，黎民之安康，民情之淳朴，人才之昌盛的济世之念。如，刘基的《感时述事》为五言古诗，共十首，计一千八百九十言，作于元季。^[35]作者因时述事，缘题发挥，论述了元末朝政、吏治、财政、军制、士风等诸多社会问题。如关于吏治，诗曰：“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百司并效尤，货贿从横飞”；“此辈欲何求，朘剥图身肥”。在刘基看来，元代吏治腐败与“以宽治国”的方针密切相关，故他提出整饬吏治须严肃法制，“法当究其源，剪锄去根茎”。关于用人，诗曰：“大权付非类，重以貽笑颦”；“滥官舞国法，致乱有其因”；“忠良怒切齿，奸究竟攀援”。作者用含蓄的言辞揭示了元末奸佞当道，所用非人的局面。与《感时述事》相类，刘基的《郁离子》、《拟连珠》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国之道，以《拟连珠》所论用人问题为例，其谓：“君不自强，士多则强。故媢嫉之人庸，则士隐而君独；掎克之吏进，则民夷而国伤”；“以道养贤，则四方之民听声而来；以德养民，则四方之贤望风而慕”；“君欲任贤，当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长，乃克奏功而济事”；“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妬臣，则贤士不留”。^[36]凡此，刘基借诗歌这一文学创作方式，巧妙道出了元廷在用人政策上的缺陷，并提出了用人应该坚持的方法和原则，颇具经世意义。

另外，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江苏苏州人。其诗文笔法平淡，用意深刻，有不少触及民生疾苦和社会痼疾，比如《外宅妇》、《无禄员》、《官卖田》、《水深围》、《德政碑》等。

其中，七言绝句《无禄员》云：

无禄员，仓场库务税课官。尊卑品级有常调，三年月日无俸钱。既无禄米充口食，家有妻儿徒四壁，冬来未免受饥寒，聊取于民资小力，宁将贪污受赃私，不忍守廉家菜色。贪心一萌何所止，转作机关生巧抵。臣闻古者设官职，俸禄养身衣食备。父母妻儿感厚恩，清白传家劝子孙。良史每书廉吏传，邑民常奉长官尊。国家厚德际天地，禄养官曹有常例。更祈恤养无禄人，免教饕餮取于民。[37]

所谓“无禄员”，指没有俸禄的官员。该诗不是反映贫富之对立，也并非抨击社会之不公，只是用含蓄的言语揭示了元末官员因“无禄”而勇走贪途这一社会问题。诗人欲借诗讽谏，以引起当政者对官俸的注意。

再如王冕，科举不中后，游寓四海，先后到达杭州、苏州、南京、扬州、徐州、大都、洛阳等处，沿途写了大量体察民情、吊古伤今、揭露时弊的诗作，如《伤亭户》、《悲苦行》、《江南妇》、《陌上桑》、《蛤蟆山》、《冀州道中》等，其中有云：“青松生崇冈，土浅松根颓。顾兹岁寒质，岂匪栋梁材？无奈牛羊牧，鄙贱蒿与莱。惟有溪上风，清声寄余哀。庭前碧梧树，上有幽栖禽。养成五彩雏，鸣动黄钟音。拟之箫韶间，叶彼圣贤心。夫何失其所，委置荆杞林。”[38]诗中作者以借喻的手法，揭示了元末轻视人才的事实。本来是如松的栋梁之材，却被鄙视如蒿莱；本来是有文采、有德音的风雏，却被弃置荆棘之中。缘此，他认为朝廷用人政策应落到实处，而不能作表面文章，他说：“圣主临朝问好官，岂无公论在长安？野人不入麒麟画，御史都簪獬豸冠。”[39]建议作为言官的御史，应该勇于承担起弹劾奸邪，荐举贤达的责任。

三、务求实学，引领学风

自蒙元政权建立伊始，务实精神就贯穿于元代社会的方方面面。[40]就思想学术领域言之，承宋代学术之余绪，元代思想界出现了朱陆并存和朱学渐长的学术格局。受其影响，士人多重视经世致用与民生日用之学。降及元末，士风丕变，学术分流，一部分士人不求务实，“徒尚虚名”[40]，步趋“浮靡之风”[41]；与之相反，一批有识之士则面对国运渐衰之势，忧患意识悄然觉醒，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仅在“立功”上追求经世致用，在“立言”上也恪守求真务实。于是，一股“明体以达用”[42]的实学思潮蔚然兴起。

（一）强调求真务实的学术观点。

在元末，经世之士强调“士当治世思欲致用”[43]、“为学贵适用”[44]。在其看来，一切言谈、学说，都应当有益于国计民生，因为天下兴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学术；要拯救天下、端正人心，必须明辨学术，而学术必须以经济世务为终极价值。所以宋禧说：“夫业不可不慎也，而士之业最优，然业士者，又有浮华笃实之辨，而气化之盛衰系焉。是故气化醇厚则学成，而辅世者往往皆笃实之士，而浮华之习不能胜。呜呼！笃实之士恒学其所当学，舍是以浮华而陷祸者众矣，况可厌士之恒贫贱而徙其业乎？”[45]认为作为士人应做“笃实之士”，惟其如此，才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辅世者”。那么，如何成为“笃实之士”呢？元末士人的观点似乎并未超迈前人，即仍认为须从研读圣贤之书、反求四书五经开始。在他们看来，圣贤经典乃经世之学之根基，士人应该潜心圣贤之道，“夫诚意正心之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具，皆学者所当穷格之先务，非可以临渴而掘井也”，“务在明体达用”。[46]如此才能做到“读书而明圣贤之学，入仕而行圣贤之道”[47]。与这种认识相联系，一大批士人潜心经学，涌现出一系列经学著述，推动了元末经学发展的新高潮。

元末部分士人关于学术之实用价值的表述，似未脱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总体规模，仍认为修身立本，涵养道德，固然为善，但若不通达国政治体，不明国家之本末原委，就难以担当天下职事，个体道德亦难以推而广之，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便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主张“学有体用，治有本末，识时务之俊杰也”[48]，即要立足于现实，体道经邦，将所学“圣贤之道”付诸社会实践，是官员就应该坚持“政由学问，而致是亦吾之所当学”[49]的理念，做到“读书为通

儒，治事为良吏”[50]；是学者则应该“立功言以垂霄壤”，做“致君泽民”[49]的事情，将学问与政事紧密结合起来，而不能“多偏于一长，能文辞者或啬于为政，善政治者又或于文章家有未暇焉”[51]，“既仕而弃学，则素餐之讥至”[52]。要象蒙古儒士伯颜一样，虽为隐士，但志存高远，又经略四方之志，“其为学专事讲解，而务真知力践，不屑事举子词章，而必期措诸实用”[53]。也有要象汉族儒士汪汝懋一样，既关注“德刑政治，驰誉一时”，又“能存心艺苑，扬声士林”[53]，二者兼具，才算“学问政事同出于士”[52]。也正因此故，士人通过对“圣贤之道”的现实践履，其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才会得到充分发挥，才能真正成为“笃实之士”、“学知力行之士”[54]。

同时，在元末经世思潮中，还表现出一种特色鲜明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一方面，经世之士以积极主动的求实精神，讲求学术的创新和实践。以元末新安（今安徽黄山）理学家赵沅（1319-1370）的学术主张为例，其学术思想出自朱学，但又不以朱学为依归，坚持在“和会朱陆”之时，做到有所发明，和而不同。出乎此，他提出了“求实理”的治学思想，认为“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55]，即要在读书的过程中，不应步趋朱子“文义”之理，而应有自己的主见，通过自己的努力探寻理学的真实之理、本来之理；而且，对于所得之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应“知其所以然”。这种摆脱盲从而进行独立思考的主体意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赵沅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不仅如此，他还批评时人说：“近世君子多以辨析义理便是朱子之学，纂述编缀便是有功斯文，故于向上工夫鲜有发明，日用之间无所容力。”[46]可以说，赵沅的学术主张和治经路径，不仅是对固守朱学、不求“本真”学风的矫正和反动，更推扬了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与赵沅同时代的另二位新安理学家朱升（1299-1370）、郑玉（1298?-1358），也分别提出了求“真知”、求“本领”的主张，此与赵沅的“实理”观点，辞异而意同。由此，形成了元末理学阵营中反对墨守先儒成说、循途守辙的思潮。

另一方面，受宋代性心之学及元代佛道思想的影响，元末学界盛行空疏、虚妄之学。对此，经世之士进行了批评。当时，一些学者对于“圣贤之道”，“不能身体而力行，徒以空言目之”，经世之士认为“空谈性命、仁义、道德之学”，实在是“迂阔于事情”[56]，无补于民生实际，并告戒说：“顾学莫先于立志，志既定然后即物以穷理，存心而致知，力行以求至。惟日孜孜无少间断，则入道有方，进德有序，圣贤可驯致，苟有一毫为利近名之心，则非为己之学矣。”[57]而对于那些只知埋头于寻章摘句、“工虫篆之辞”[58]的学者，经世之士也不以为然。如戴良（1317-1383）批评道：“近代贤材而怪士之为学多不适于世用，谈经术者，徒知章句之当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学者，又方务以言语声偶，摘裂相夸尚，每弃本而趋末，求其可用于当时，盖不数数然也。”[59]与戴良相比较，陈高（1314-1367）的批评更为深刻、犀利，他说：

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无其人也，非无其人也，有其人而不为文章之司命，或为文章之司命又循常习，故而莫之变焉。此文气所以日卑下，而其势固不能以振起也。……凡今世之士，工虫篆之辞，饰粉黛之语，缉陈言，夸记问，斗侈靡，寝寝焉；竞取于萎蕤颓堕、溃败腐烂之乡，而莫知其所止。今海宇混一际古所未有，冲原之气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当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气，独尔卑下，何欤？然则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气之不振也，若此非无其人为之倡欤，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责哉！[58]

在此，陈高不仅描述、批评了元末“文章不振”之风，更认为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非世之然”，而是源自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因循之习。言下之意，是期待学界能够涌现出能够引领学风的“倡之者”，力纠萎靡学风，倡扬务实之风，如此才能重振“文气”，裨益于世。

（二）追求学以致用用的学术行为。

元末士人的经世意识不惟停留在口头上，更能付诸于实际行动中。以其著述实践为例，经世之士在著书立说之时，多率不忘将经世之意贯注于其中。兹略举数例，以窥其仿佛：

谢应芳（1296-1392），字子兰，江苏武进人。生逢乱世，世衰道丧，笃志好学，潜心性理之学。

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覡、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皆为盛行于元末的迷信思想和活动。谢应芳“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60]，根据事实，揆以情理，加以批判，甚至将佛、道宗教，亦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61]。应该说，面对风靡一时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谢应芳敢于著书立说，“以开导愚迷，有益于劝戒；辟邪植正，有益于世”[60]，这种经世精神在科技落后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强调学术经世、文道合一的观点，认为：“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62]其所著《浦阳人物记》二卷，成书于至正初年，后人汇辑成编。全书凡五目：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所载共29人。书中博引正史、家谱、方志、碑铭及各种见闻[63]，“多纪善之辞”[64]，“唯有关治教者则书，不问乎其他”[65]。宋氏此书，旨在通过对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事迹的记载，以“扶植纲常”[64]、“以为世鉴”[65]，经世之意昭著可见。

李士瞻（1313-1367），字彦闻，河南新野人，至正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著《经济文集》六卷，成书于至正初年，后由其曾孙李伸汇辑成编。书中虽多属一时酬答之作，但冠以“经济”之名，亦旨在经世致用。其中所载多为时务，尤其是“当时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俱可藉以考见梗概”。故四库馆臣评价曰：“士瞻之弥缝匡救，委曲周旋，其拳拳忧国之忱，不惮再三苦口，尤有为人所难能者。”[66]作者藉著述以匡时世的旨趣由此可见。亦正因如此，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当时作为枢密副使李士瞻才会上疏极言时政凡二十事。[67]

戴良，字叔能，浙江浦江人。著《治平类要》，是文“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与汉唐宋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论赞，会粹成书”。凡十篇：君道篇、任相篇、驭将篇、用人篇、爱民篇、足食篇、制兵篇、慎刑篇、远佞篇、纳谏篇，皆是关乎国运民生的要务。诚如作者自己所言，该文虽“多简略”，然“开基之主，继体之君，苟能潜心于此，穷讨而深思之，则稽古学古之效，复见于今日，而此书之作要不为无小补矣！”[68]持论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样是希望通过此文能对统治者经邦治国有所补益。

以上例子只是元末经世之文的代表，类似的著述尚有很多。如宋濂的《秦士录》、《记李歌》，刘基的《卖柑者言》、《梁甫吟》等，皆强调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效果，并希望以此能振偏救弊，纠正空疏浮艳之风。另以经学著述言之，元末学者潜心先秦经典，虽不乏参加科考之意，但更多的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六经乃统天地之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天地之道，帝王之法”[69]。所以，他们研经旨在明道，明道则意在救世，所谓“翼经以明道，析理以传经，其于三才万物之理，治忽几微之验，名物度数之详，兴坏理乱之故”[70]。这种学术行为既是对先贤著述传统的推扬，也是对当时学风学风的导引和矫正。

然而，在元朝将亡之际，士人要想顺利实现经世目的，显得极为困难。很多儒士虽能“指画天下事，出入古今成败利害”，但却不能“以为国家用”[71]。所以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无奈：“有兽维麟兮，猎者获之。折肢毁肤兮，曾不如鹿与麋。呜呼！哀哉兮，尔何生于此时？周公已矣兮，吾能不悲！”[72]“呜呼！天既生人之才以为用，然又天阙不使直遂者，不可得而知也。”[73]在此情况下，一些士人逐渐对蒙元政权丧失信心，其态度也渐次由拯世走向疏离，甚而走向对立。这一过程对于有志于明道救世的士人而言，无疑是极为痛苦的，但在不可遏止的时势面前，他们不得不艰难地做出新的抉择。同时，从学风上讲，在儒士文人地位相对卑微的元代，士人的经世情怀纵然可以形成一种风气，一定程度上纠正当时的世风败俗，但尚未形成能够与空疏学风相抗衡的风气，更难形成能够引领时代精神的学术主流。

参考文献

- [1] 胡行简. 樗隐集[M]. 卷6:《元故朱公墓志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 王冕. 竹斋集[M]. 卷中:《闰七月二十三夜记梦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王冕. 竹斋集[M]. 卷中:《自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宋濂. 文宪集[M]. 卷10:《王冕传》, 明人文集丛刊本.
- [5] 宋濂. 文宪集[M]. 卷25:《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 明人文集丛刊本.
- [6] 柯劭忞. 新元史[M]. 卷216:《李士瞻传》, 上海: 开明书店, 1935.
- [7] 王祎. 王忠文集[M]. 卷16:《上平章扎拉尔公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张之翰. 西岩集[M]. 卷14:《送鲜于都事赴任杭州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陈高. 不系舟渔集[M]. 卷9:《戊子元日客中有感》, 敬乡楼丛书本.
- [10] 吴师道. 礼部集[M]. 卷14:《送吴彦县尹之辰溪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赵汭. 东山存稿[M]. 卷3:《沧江书舍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林弼. 林登州集[M]. 卷8:《送高君善夫归闽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贡师泰. 玩斋集[M]. 卷6:《送朱元宾赴南靖县尹序》, 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年(1525年)徐万壁重修本.
- [14] 余阙. 青阳集[M]. 卷2:《贡泰父文集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吴师道. 礼部集[M]. 卷17:《家则堂诗卷后题》,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6] 吴师道. 礼部集[M]. 卷17:《北山感雪竹赋后题》,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陶安. 陶学士集[M]. 卷12:《送王子楚序》,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 [18] 贡师泰. 玩斋集[M]. 卷首:李国凤《玩斋集原序》, 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年(1525年)徐万壁重修本.
- [19] 陈高. 不系舟渔集[M]. 卷11:《送刘景玉赴金华县学教谕序》, 敬乡楼丛书本.
- [20] 谢应芳. 龟巢稿[M]. 卷12:《与林掌教论请建先贤祠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 郑玉. 师山集[M]. 卷2:《狄梁公论》,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 王礼. 麟原文集[M]. 前集卷6:《重修安福县学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 王祎. 王忠文集[M]. 卷19:《演连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4] 王祎. 王忠文集[M]. 卷16:《上平章扎拉尔公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5] 王结. 文忠集[M]. 卷4:《上中书宰相八事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6] 宋濂. 元史[M]. 卷186:《成遵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7] 宋濂. 元史[M]. 卷42:《顺帝纪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8] 王结. 文忠集[M]. 卷4:《上中书宰相八事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贝琼. 清江文集[M]. 卷30:《黄南岫先生墓志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0] 柯劭忞. 新元史[M]. 卷238:《黄许传》, 上海: 开明书店, 1935.
- [31] 徐伯龄. 蟬精隽[M]. 卷13:《南村外史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2]柯劭忞.新元史[M].卷236:《朱公迁传》,上海:开明书店,1935.
- [33]陈高.不系舟渔集[M].卷19:《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敬乡楼丛书本.
- [34]宋濂.文宪集[M].卷24:《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明人文集丛刊本.
- [35]刘基.刘基集[M].卷20:《感时述事十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36]刘基.刘基集[M].卷14:《拟连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37]顾嗣立.元诗选[Z].初集:《朱德润·无禄员》,北京:中华书局,1994.
- [38]王冕.竹斋集[M].卷中:《秋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9]王冕.竹斋集[M].卷中:《偶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0]明太祖集[M].卷8:《赐平凉县尹王辂父谕》,明人文集丛刊本.
- [41]程端学.积斋集[M].卷3:《赠潘氏二子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2]宋濂.文宪集[M].卷20:《唐思诚墓铭》,明人文集丛刊本.
- [43]陶安.陶学士集[M].卷11:《送燕叔义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 [44]唐元.筠轩集[M].卷2:《湖州张守复还安定先生墓道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5]宋禧.庸庵集[M].卷11:《送倪叔恂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6]赵汴.东山存稿[M].卷3:《答倪仲弘先生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7]陈高.不系舟渔集[M].卷13:《故宋学士徐公墓志铭》,敬乡楼丛书本.
- [48]王礼.麟原文集[M].前集卷2:《罗浮翁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9]李继本.一山文集[M].卷4:《送北平知府方公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0]李继本.一山文集[M].卷4:《送知县刘侯鞅满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1]戴良.九灵山房集[M].卷21:《避斋小稿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 [52]释妙声.东皋录[M].卷中:《宦游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3]宋濂.元史[M].卷190:《伯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 [54]赵汴.东山存稿[M].卷2:《对问江右六君子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5]程瞳.新安学系录[M].卷15:詹烜撰《赵东山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6]赵汴.东山存稿[M].卷6:《一笑居士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7]吴海.闻过斋集[M].卷4:《阜林乡学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 [58]陈高.不系舟渔集[M].卷15:《上达秘卿书》,敬乡楼丛书本.
- [59]戴良.九灵山房集[M].卷6:《赠勾无山樵宋生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 [60]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卷93:《辨惑编》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1]谢应芳.辨惑编[M].卷4:《异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2]宋濂.文宪集[M].卷2:《华川书舍记》,明人文集丛刊本.

- [63] 宋濂. 浦阳人物记 [M]. 卷首: 戴殿泗《重刻浦阳人物记后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4] 宋濂. 浦阳人物记 [M]. 卷首: 郑涛《后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5] 宋濂. 浦阳人物记 [M]. 卷首: 欧阳玄《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6]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 [M]. 卷 167: 《经济文集》提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67] 刘基. 刘基集 [M]. 卷 46: 《顺帝纪九》,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 [68] 戴良. 九灵山房集 [M]. 卷 6: 《治平类要总序》, 四部丛刊初编本.
- [69] 郑玉. 师山集 [M]. 卷 3: 《春秋经传阙疑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0] 郑元祐. 侨吴集 [M]. 卷 10: 《藏书楼记》,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 [71] 胡翰. 胡仲子集 [M]. 卷 4: 《屠先生诗集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2] 刘基. 刘基集 [M]. 卷 16: 《获麟操》,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 [73] 杨维桢. 东维子集 [M]. 卷 25: 《冯进卿墓志铭》, 四部丛刊初编本.

Discussion on the end of the Yuan Scholars rescue World feelings and sense of statecraft

ZHAN long

(Henan Universit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Henan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In the final of Yuan Dynasty, Monarch was very fatuou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corruption, so the social of that time was darkness. They were going to be an official to save the world and give comments, suggestions and ideas or to be a scholar to instruct other learners. They intended to destroy the repeated suppression, although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do so, they state craft efforts undoubtedly highlight its rich and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istoric mission. To certain extent, they played and commented on current affairs, the social puzzle and the social morale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Keywords: the final of Yuan Dynasty; scholars; rescue world; statecraft

收稿日期: 2012-11-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河南大学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

作者简介: 展龙 (1976-), 男, 汉族, 甘肃靖远人。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后,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明史研究。